一、东北重镇沈阳

沈阳是辽宁省和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全国著名的重工业城市。全市人口 250 多万,有汉、满、回、朝、锡伯、蒙古等 15 个民族。市内划分为和平、沈河、皇姑、铁西和大东 5 个区还包括东陵、于洪、苏家屯、新城子 4 个郊区和辽中、新民两个县,总面积为 8433 平方公里。

沈阳历史悠久,早在几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生息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历史和文化。两汉时期,沈阳称为“候城”,这是见于史籍的沈阳的最早的名称。到了唐代,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靺鞨兴起,他们建立了渤洲国地方政权,改候城为沈州。到了辽代,统治者认识到沈州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对沈州实行大量的移民政策。这样,沈州人口逐渐增多,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金末元初,由于连年战火,沈州城垣几乎全部化为废墟。元统一全国后,在沈州废墟上重建城廓,并改沈州为沈阳路。从此,沈阳在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方面,都日益显示了其重要性。到 1625 年(后金天命十年)后金政权的创史人努尔哈赤迁都沈阳,沈阳便闻名遐迩了。

沈阳位于浑河之北,浑河古代称之为沈水,根据中国“水北为阳,水南为阴”的传统观念,故得名沈阳。但东北民间认为,沈阳原本应叫“沈羊”,以后才改名为沈阳,为什么呢?有一个关于沈阳城的优美传说,可帮助我们解开这个谜。

据说很久以前,沈水北岸的石嘴头山(今天柱山)住着一户姓沈的人家,家中只有母子二人。沈妈妈年老体弱,但其子沈哥长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膀大腰圆,身强体壮。母子俩相依为命,捕鱼为生。有一天,突然沈水泛滥。暴雨普降,两岸房塌地淹,人死畜冲,十分凄惨。一天,沈哥在河底捉鱼时，偶然知道，原来沈水中住着一条三头蛟龙，它为了不断吃到童子肉而不停地兴风作浪。沈哥知道这个秘密后义愤填膺，决心杀死蛟龙，为民除害。可他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斗不过蛟龙。正在沈哥为难之时，东海龙王的三女儿羊妹来了，她把自己的龙鞋和龙手套交给沈哥，让他穿着龙鞋上天，戴着龙手套把太阳搬来，这样就可以烤死蛟龙。当沈哥拼着命把太阳搬来放在蛟龙背上时，他自己也因过度疲劳而掉入河中。羊妹情急之下也冲入了沈水，因她没有龙鞋和龙手套，也沉了下去。当附近的乡亲们闻讯赶来打捞沈哥和羊妹时，已不见他们的踪影。于是老百姓在沈水北岸立一石碑,上书‘ 沈羊 ’以为纪念。后来在此修城,就改名为‘ 沈阳 ”。

今日之沈阳，发展迅速，到处高楼林立，其机械工业在全国首屈一指，古老的沈阳城焕发出勃勃生机，正在步入现代化的大都市行列。

清初的盛京宫阙——沈阳故宫

沈阳故宫是全国保存下来的最完整的两座宫殿建筑群之一，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两位汗王营造和使用过的宫殿。因而以完整、璀璨、浓郁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历史地位而著称于世，成为第一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沈阳故宫，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建都沈阳起到清高宗乾隆皇帝扩建完成(即 1625 年至 1783 年),先后经过 100 多年才建成今天的规模。皇太极继位后,为修筑这座宫殿,征调了居住在东北地区的 20余万人，从浑河上游原始森林中砍伐木材 9000多立方米,在海州（今辽宁省海城县析木乡）缸窑岭烧制砖瓦 700 多万块,再将这些建筑材料运往沈阳。后金统治者还从各地召集能工巧匠几万

人。沈阳故宫在继承中国古代汉民族建筑艺术特点和风格的同时，也吸收了满、蒙、回、藏等多民族的艺术精华，使之成为多民族建筑艺术的大融合体。因此，可以说它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血汗和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

沈阳故宫建筑群，设计布局完整，造型结构新颖，工艺水平很高。它位于沈阳旧城中心，南北长 15.2 丈，东西宽 32 丈，全部建筑 90 余所，共 300 余间。宫殿的周围为砖墙，宫阙正门上悬挂着“大清门”三个绚烂的大字。门两旁有石狮一对。门前有辕门，东门为左阙门，也叫东华门；西门为右阙门，或称西华门。大清门对面为砖饰蟠龙大影壁，左右为奏乐亭和朝房。横街北面，为当年后金的宫殿。从高处看去，整个故宫金瓦红墙，光彩夺目；白玉石栏，庄重大方；五彩琉璃，色彩斑斓；雕梁画栋，巧夺天工。

然而，沈阳故宫的建筑群，并非一开始就具有如此规模。清朝统治者在这里居住总共才十年左右，有一大部分建筑是在迁都北京后补建的。从建筑时间上，我们可把它大体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建筑，是从 1625 年至 1636 年所建，包括东路的大政殿与十王亭；中路的大清门、崇政殿、飞龙阁、翔凤阁、凤凰楼、清宁宫、关雎宫、衍庆宫、麟趾宫、永福宫、东配宫、西配宫等，这些是皇帝举行大典议政、宴会以及后妃居住的场所。这时的建筑因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急于迁都沈阳和迫于登基称帝，所以建筑规模较小，形式也较简陋，但刚健质朴，重于实用。中期建筑，包括故宫中路的日华楼、霞绮楼、师善斋、协中斋；东宫颐和殿、介趾宫、敬曲阁；西宫迪光殿、保极宫、继思斋、崇谟阁等。这组建筑是迁都北京后，乾隆皇帝“东巡”来沈阳驻跸这里，见其形制简陋，难以与北京宫殿相媲美，遂下命维修和扩建的。后来这里就成为乾隆“东巡”沈阳时居住和收藏“玉牒”、“满文老档”的场所。晚期建筑，是 1782 至 1783 年建成的。包括西路的戏台、嘉荫堂、仰熙斋和文溯阁等，是为皇帝“东巡”盛京时读书、看戏和存放《四库全书》的场所。

从内部布局看，沈阳故宫也可分为三大部分，即以大政殿为主体的东部建筑和以崇政殿为主体的中部建筑以及以文溯阁为主体的西部建筑。各部建筑因修建年代不同，名称前后也有所更改。

大政殿也叫笃恭殿，形为重檐八角攒顶式，这是仿辽阳东京城八角亭建造起来的，所以又叫“八方殿”。殿中有高约 1.5 米的须弥座台，周围以雕刻精致的荷叶净瓶石栏杆围绕。八面均为“斧头眼”式隔扇门。内顶有极为精巧的斗拱、藻井、天花板。外檐出五踩双下昂头拱和用“和玺”彩绘的梁架。在两大柱子上雕有两条蟠龙，张牙舞爪，甚为雄伟。这里是皇太极与诸贝勒大臣们决议朝政和顺治皇帝福临继位登基的地方。以后，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几次“东巡”时，都在此举行朝会大典。

在大政殿前，中间是甬道，两侧排列着 10 座大小形制完全相同的亭子式建筑，俗称“十王亭”或“八旗亭”。其分别为东侧的左翼王亭、正黄旗亭、正红旗亭、镶蓝旗亭、镶白旗亭和西侧的右翼王亭、镶黄旗亭、镶红旗亭、正蓝旗亭、正白旗亭。这里曾经是清初八旗军政组织的指挥中心。凡有重大的军事行动，皆在大政殿颁布军令，调动八旗军队，在左、右翼王的率领下分赴各个战场。这种把“圣汗”御用大殿与八旗王公大臣办事的“王亭”同时建在皇宫大内，形成“君臣合署办公”的局面，在中国宫殿建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正反映了清初满族社会实行的“军政合一”的八旗政治制度。

以崇政殿为主体的中路建筑，是所谓“大内”宫阙，也是整个建筑群的中心。在大清门的东、西有角门，东面为东翔门，西面为西翔门。再往东为清太庙，是清王朝祭祖的地方。再往西为原内务府档案房。进入大清门，东有当年文武官员进谒朝集的地方飞龙阁，迁都北京后，飞龙阁改为宝物库，收藏历代的珍贵文物和努尔哈赤、皇太极作战用的甲胄及兵器等。西边是翔凤楼，这也是文武百官朝集之地，后来用作收藏书画、古籍及蒙、藏、回文的译本《五体文鉴》和《满蒙文古源》等御用品。

崇政殿，又称正殿，是当年皇太极日常朝会群臣的地方。其为五间九檩硬山式，前后有出廊，围以石雕栏杆，望柱之下有吐水螭首，构造十分精巧。更为奇特的是，殿堂用黄琉璃瓦铺顶，加镶绿琉璃瓦边，这与北京皇宫殿顶全用黄琉璃瓦铺顶不同。这大概象征森林、草原的绿色，表示对故乡的深深眷恋。殿中两个蟠龙金柱之间，是贴金雕龙扇面大屏风宝座，座顶高悬“正大光明”匾额，殿前有雕龙玉阶，阶下有石垒大月台。殿后是皇子居住的日华楼和读书之所师膳斋。西面是皇女居住的霞绮楼及书房协中斋。

登高台便进入后宫，这里有壮丽的翔凤楼，楼高三层，为三滴水歇山式，以彩绘粉之。皇太极当年在此计议军政大事，后改为收藏“实录”“玉牒”“圣训”等的场所。

再往北是清宁宫，或称正宫，这是一座硬山前后式五间建筑，其中有皇太极和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寝宫。这里建有具满族特色的火炕、火地，而且凡窗扇均外糊，从外面开关。据说这是因满族在早期的时候，成年人都出外劳动，只将孩子留在屋内，窗从外面开关，可以防止野兽闯入。纸糊在外，似有外表美观之意。东北地区的汉族也有此风俗。所以民间有一歌谣：“关东山有三怪，窗户纸糊在外，大姑娘叼烟袋，养个孩子挂起来（指悬挂的儿童摇车）”。盛京皇宫也不例外，将窗户纸糊在了窗棂的外面。

在清宁宫两侧有东、西两配宫。东配宫为宸妃居所关雎宫和庄妃居所永福宫，西配宫为贵妃居所麟趾宫和淑妃居所衍庆宫。在这些宫内，建有具满族特色的南、西、北三面相连的“万字炕”，以及傍宫后西北角而建的烟囱等等，这些都反映了满族的生活习俗，也区别于北京故宫的建筑。

总之，沈阳故宫作为清王朝的肇基之地和清初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其“内容”到“形式”都有独特的风貌。因而，它是人们研究清史不可多得的物证。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八旗亭”与八旗制

盛京故宫院内大政殿东西两侧，依序排列着十座亭子，人们习惯地称它们为“十王亭”,或“八旗亭”。人们不禁要问,为何在皇宫大院内建这十座亭子呢？这与清朝的八旗制度有关，是依据努尔哈赤创建的军队组织而建造的。

八旗亭的来历，与军队建制有密切关系。公元 1615 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统一东北及各部的战争中，首先把军队编成四个方面军,并以黄、红、白、蓝四种旗帜为标志加以区别,这样就产生了四旗。旗,满族称“固山”,它的基层组织是“牛录”,汉译意为“箭的主人”，来源于满族先民女真人的生产组织。女真人以狩猎和采集植物果实为主要生产手段,在狩猎时,每 10 人为一队,队中每人拿出一支箭交给射猎技艺最高、并有组织能力的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这个“牛录”的“额真”(主人)。努尔哈赤在创建军队时,把每 300 人编成一个牛录,任命一人为“牛录额真”,来统辖这个牛录。每 5 个牛录(即 1500 人)为一个“甲喇”(汉译意为“队”),每支甲喇指派一人为“额真”,叫做“甲喇额真”。5 个甲喇(即 7500 人)再组成一个“固山”,这就是旗。旗的首领被称为“固山额真”。固山额真之下,还要设两个“梅勒额真”(即副主人),作为固山额真的助手。清入关以后,牛录额真改称为“牛录章京”,甲喇额真改称为“甲喇参领”,“固山额真”改称为“旗都统”,“梅勒额真”改称为“副都统”。这些制度表现在旗帜上,凡是正旗(或叫整旗)均为四个角,呈正方形,彩绘龙纹、火焰 镶旗(也叫厢旗)均为五个角,其一边呈三角形,另一边呈方形。黄、蓝、白三旗镶红边，红旗镶白边。清入关前，除了 1601 年建立满洲四旗(正旗)外,1615 年，又增建了四个镶旗;1635 年，又设立了蒙古八旗;1642 年,再添汉军八旗。以后,八旗中,又分上三旗和下五旗。上三旗是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这三旗直接

隶属于皇帝,地位较高。其余为下五旗 正红旗、镶白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八旗在行军作战时,又分为左、右两翼,左翼由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组成 右翼以正黄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组成。清统一全国后，又将八旗军队分为在京八旗（也叫京营)和驻防八旗(驻防在全国各要冲地带)。在京八旗又分郎卫和兵卫两大部分。郎卫的主要任务是侍卫皇帝，人员从地位较高的上三旗中挑选，由侍卫大臣统率，其中也包括虎枪营。兵卫由八旗都统直辖,主要是骁骑营 其他如前锋营、护军营、健锐营、火器营等,另置统领管辖。驻防八旗由各地的将军、都统、城守尉统率。除了八旗之外,把改编的明朝军队另置‘ 绿旗营 ”,作为八旗之外的补充军队。

由于在作战中，八旗军队英勇顽强，屡建功勋，已经成为后金政权的强大支柱。所以，远在赫图阿拉时期，努尔哈赤凡遇军国大事,必于‘ 殿之两侧搭八幄,八旗之诸贝勒、大臣于八处座 ”,共商大计。而八旗王贝勒，自然都是由努尔哈赤的兄弟子侄充任。随着爱新觉罗氏家族中的汗位之争愈演愈烈，特别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因‘ 佐理国政 ”,权势日重,相互间的矛盾斗争更为激烈。在经历了两次立储失败后，1622 年(天命七年),努尔哈赤不得不重申维持八和硕贝勒‘ 共治国政 ’的联合政体，并提出公推新汗的条件，进一步发挥了这种军事民主政体的思想。

在迁都沈阳后，为了便于商讨国家大事，在建筑办事“ 大衙门 ”的同时，自然产生了伴随八旗制度的八旗王亭这种新设置，把八旗临时的帐篷加以固定化，这才盖了八旗亭。“ 八旗亭 ”的建筑形式，是后金统治政体的反映，是权力的象征。

“ 八旗亭 ”(或‘ 十王亭 ”),其最靠近大政殿向前略为突出的两座为左右翼王亭,其余八亭则按八旗旗序呈‘ 八 ’字形排开。东侧为左翼王和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王亭；西侧为右翼王和正黄、

正红、镶红、镶蓝四旗王亭。

皇太极继位后，为了加强皇权，不断削弱八旗王贝勒的势力，将努尔哈赤时期作为议政大臣会议处所的“八旗亭”，变成了八旗各置办事和值班的处所。后来朝廷内又设立了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院和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及都察、理藩二院，这样八旗王公贵族的势力再次被削弱，于是“八旗亭”也就只是作为八旗值班官员听候传唤的处所。清入关后，不论京师或各大城邑，再未出现过这种建筑形制。因而，清初的皇宫大院内建八旗亭，就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一大特色。

文溯阁与《四库全书》

在沈阳故宫金黄色的建筑中，唯独西北角有一座翠绿色的楼阁，这就是专为贮藏《四库全书》而修建的清代沈阳最大的藏书楼——文溯阁。

文溯阁位于沈阳故宫的西路，是乾隆四十七年至四十八年(1782—1783)续建的。阁楼为黑琉璃瓦绿剪边的二楼三层建筑，阁上梁枋间彩绘着‘白马献书’图案。它所以用黑色琉璃瓦为顶，据说是以‘五行八卦’之说‘北方壬癸水，其色属黑’为依据的，黑是代表水。文溯阁是专为存贮清代大百科全书《四库全书》所建的全国七阁之一，而书最忌火，以黑瓦为顶，象征着‘以水克火’之意。文溯阁的建筑形式仿明代宁波大藏书家范钦天一阁的样子而造成，整个建筑给人以闲静、安适之感。

1773 年(乾隆 38 年)，清政府出于政治需要，设立了‘四库全书馆’征集天下书籍。对有反清内容的一律焚毁，其余凡认为有用之书则按经、史、子、集四部编纂合一，名称《钦定四库全书》。其内容包括历史、地理、政治、民族、社会、制度、宗教、天文、物产、文艺、哲理、美术、矿产、农工、医学以及其他百家杂学。这部书的编纂，动

用了各级官员千余人,花费了 10 余年时间。《四库全书》共计 3.6 万余册,共抄写了 7 部。为贮藏这些书，清政府分别在北京的圆明园建起了文源阁(乾隆四十年〔1775 年〕建)、河北的热河建起了文津阁(今承德,乾隆四十年〔1775 年〕建)、江苏的江都县建起了文汇阁(今扬州大观堂,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建)、杭州孤山圣因寺建起了文澜阁（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建)、江苏镇江金山寺建起了文宗阁（乾隆四十四年〔1779 年〕建)、北京故宫建起了文渊阁(乾隆四十年[1775 年]建)及盛京故宫建起了文溯阁(乾隆四十八年〔1783 年〕建成)。七处各贮藏了一部《四库全书》。

盛京文溯阁的《四库全书》在贮藏中，其各部分在阁中都有定位 经部 20 架，960 函，计 5493 册贮于下层；史部 33 架，1584 函，计 9493 册贮藏于仙楼(二层)；子部 22 架，1584 函，计 9073 册和集部 28 架，2016 函，计 12265 册，贮于顶楼。此外，还贮藏有各部总目录和考证书册，计有经部总目录 5 函 30 册，经部考证 3 函 18 册；史部总目录 5 函 30 册，史部考证 3 函 18 册；子部总目录 5 函 30 册，子部考证 3 函 18 册 集部总目录 5 函 30 册，集部考证 3 函 18 册。清代曾设文溯阁衙门，置九品催长、无品级催长各一员，专门管理文溯阁和《四库全书》。

到清末，政局动乱，内外战祸频繁，七阁《四库全书》损失过半，其中，圆明园的文源阁于咸丰十年（1860 年）英法联军入侵时被纵火焚毁。杭州文澜阁 1860 年阁圮，书籍流散，光绪六年(1880 年)重新补抄，后藏于浙江图书馆。承德文津阁的《四库全书》于 1915 年运往北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镇江的文宗阁于咸丰三年（1853 年）毁于大火，江苏扬州文汇阁的大观堂也在 1854 年毁于大火。文溯阁的《四库全书》于 1914 年(民国 3 年）袁世凯称帝前被运往北京，直到 1925 年段祺瑞上台，不久北京实权掌握在奉系军阀手中，杨宇霆等人怂恿张作霖将这套丛书运复原藏地，并责成奉天教育会代为保管，但《四库全书》已不成全书了，经检点发现遗失 72 卷。

后经奉天教育会组织人重新补抄，花了一年时间才将其补齐，解放后国家为了保护此书的安全，特将这些书藏于甘肃省。文溯阁经过整修，也复原并向游人开放。

在文溯阁的东面有一座黄琉璃瓦顶的碑亭，亭内碑的正面刻有乾隆皇帝亲自撰写的《御制文溯阁记》，碑的后面刻有《宋孝宗论》。碑文记录了文溯阁的建阁经过和《四库全书》的收藏。

清初的宫廷礼规

早在 1616年,后金(清)在赫图阿拉建国前,清太祖努尔哈赤在佛阿拉就已开始制定各项制度，所谓“前则任意行止，今则既束行止,又纳所猎’就是简单概括的明证。在迁至赫图阿拉后,由于政权处在初创阶段，故无明确的宫廷礼规。到 1621 年进入辽阳后,宫廷礼规才逐步建立起来。如当时提出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按等级而坐,以及如何管理阉割男子(即太监),建立严格的守门制度,对擅入内廷的人和失职的守卫实行严惩等的规定。在建立了辽阳新城，有了自己的汗宫和八角殿后，宫廷礼规也就更为严格和明确了。

关于上朝的礼节，在原佛阿拉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则化了。要求诸申、尼堪、蒙古所有牛录的人，在天亮以前集合于牛录额真备御的衙门并查点有无缺席。待天亮时,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备御等在固山集中，由贝勒带领在日出前到八角殿朝见。同时，规定官员出戍和有事外出，其子弟可代替朝见。

1625 年迁都沈阳后，由于连年战争和灾荒，社会混乱，秩序不稳。为此宫廷加强了警报设施,在汗宫门安置云板、铜锣、鼓。分别用于在夜间报告前方紧急消息时打云板，若有逃犯出城消息时敲铜锣，如有好消息时打鼓。

当时努尔哈赤与诸贝勒大臣家都使用太监和宫女，为了严格

管束这些下人，规定所用太监不能在女人近处，加强宫室守卫，尤其对福晋和宫女们的“乱行”限制十分严格。比如福晋们如果乱行，若是婢女告发，则重用告发的婢女并加以恩养。夫的其他妻告发时，杀有罪者，告发者可在夫那里生活。福晋和家里的婢女们上厕所时要合众一起去，不许二三人去，否则以乱行论处。在家庭供使唤的男子也不能独自行走，发现者概不宽有。

1626 年皇太极继位后，制定了一系列宫廷规章制度和礼仪，使清朝的各项典章制度日臻完善。

皇太极继位时，汗的威严已经突出，但处理朝政时仍与各贝勒大臣一起商议。1626 年(天聪元年),皇太极在大政殿接受各贝勒大臣、文武群臣的朝驾，各按旗序行三跪九叩头礼，但此时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等兄弟,列坐左右,不令下坐。一直到 1632 年(天聪六年),皇太极“面南独坐”,朝仪才正规化。1636 年(崇德元年),皇太极上尊号改元称帝,使用“大驾卤簿”“御前仪仗”,正式定了宫殿名称等。

在门卫朝班方面，规定在内门、两翼门及大清门设守门人役，并严加看守和稽查出入者。内门只有守门人役常值，其他人不容进去。侍卫、护军及其官员晨夕入朝,集合于大清门前的御道左右,面对面,不许坐在御道中。大贝勒以下出入由左、右两阶走,不能从御道走。1641 年(崇德六年)正月朝驾时,不但有诸王、贝勒、文武官员朝驾大政殿，而且增加了诸王贝勒福晋和文武各官命其妇在清宁宫朝贺皇后的制度。

此后，清朝的宫廷礼规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精细和完备。这是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所采取的措施，但对一般贫民百姓来说，这一切使宫内生活变得神秘莫测，令人畏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大政殿君臣筵宴

按清代制度，每逢国家重大庆典，一般都要在宫内举行盛大筵宴，君臣共聚，以示庆贺。皇帝东巡盛京谒陵礼成，自然也不例外。这些大型庆典筵宴，清初在大政殿举行。

据《清实录》记载,玄烨(康熙)初次驾幸盛京时,谒陵后入宫当日大摆筵宴。当时在清宁宫、大清门,设仪仗,奏乐 召盛京的将军、副都统、侍郎、年老致仕都统、副都统、侍郎及永陵、福陵、昭陵总管以下现任、解职大小官员‘ 宴赉有差 ”。筵宴后,又召将军、都统、副都统、侍郎、总管等官至御前,皇上亲自以金瓯赐酒,其余官员命内大臣等遍赐之；同时又召 80 岁以上耆老至御前赐饮。在以后康熙皇帝的两次东巡中，同样举行了这种筵宴。

乾隆皇帝初诣盛京，谒陵礼结束后，自然也效法其皇祖赐宴于旧宫,而且排场更大,礼数有增。据记载,此次乾隆皇帝入盛京皇宫驻跸后，曾有两次赐宴：第一次为在崇政殿受贺，赐诸王公文武大臣官员及朝鲜使臣宴。这是庆贺仪式中例行之事，参加者只有一些高级官员和外国使臣。当日又安排君臣耆老共聚一庭的庆贺大宴，在大政殿举行。参加者不仅有盛京官员和勋旧同族，而且随同前来的京师官员及蒙古贵族亦俱入宴，其规模之大，胜过康熙皇帝几次东巡之宴。到乾隆四十八年，原崇政殿受贺之后的赐宴与大政殿筵宴合并一同在大政殿举行。嗣后，嘉庆、道光皇帝东巡时也循此例而行。只是举行筵宴的日期及与宴人员略有不同。

作为皇帝东巡期间的一项重要庆典活动的大政殿筵宴，其准备工作不可不周。所以，皇帝每幸盛京前，便由京师和盛京内务府筹备办筵宴时所需的一切物品，诸如宴桌及食品等。筵宴参加人数和桌张数目由内阁预先撰拟进呈；与宴者座次由内务府绘图呈览；筵宴过程中的各项礼节仪式由礼部拟定，最后均需经皇上御批。

在筵宴当日，照例要有一系列繁缛的“皇家礼仪”。首先是陈放中和韶乐、清乐、丹陛乐等乐器于大政殿檐下和庭前，以备升殿、进爵诸时演奏。其次是摆放宴桌。殿内宝座正前方设皇帝所用御宴桌，其他与宴者皆按事先指定的位次排座。如乾隆十年筵宴，满族王、贝勒、贝子的宴桌设在大政殿内，盛京将军及各文武大臣的宴桌设在殿外东侧台座上，蒙古王公贵族的宴桌设在殿外西侧台座上，盛京宗室、觉罗、姻戚及其他官员和朝鲜使臣等则在殿阶之下院庭之中设桌。此外，殿前丹墀正中还要设张黄幕和反坫桌一张，上面放酒具以备进爵时用。一切准备就序，这时皇帝由驻跸之西乘轿出大清门，进入大政殿升入宝座，众官员等行礼后亦入座。先由御前侍卫进饽饽，向皇帝献茶并代赐众人茶，接着便是进爵、赐爵仪式，并由一位大臣代表众人向皇帝捧爵进酒，再由他代饮皇帝所赐之酒。然后由尚膳官员进馔于皇帝，并分给各宴桌恩赐食品，御前侍卫到各桌分别赐酒，这时筵宴正式开始。为了助兴，文武大臣们在《世德舞》乐曲伴奏下，分对至殿廊下起舞，由身强体壮擅长摔跤的力士们表演“掷倒技”“折斤斗”等传统节目。筵宴即将结束时，众官员人等齐于坐处行三叩头礼，谢皇帝赐宴之恩，内务府大臣奏筵宴礼成，皇帝乘轿还宫，众人各退。

大政殿筵宴每次参加人数和宴用食品，一般以国家经济条件而定。如康熙皇帝的前两次东巡，因当时经济条件所限，一切用度还较为节俭。到最后一次，其规模和所需膳食用品也较前两次大而多。在所用食品中有蘑菇、木耳、蕨菜以及各种米、豆、面、油、鸡蛋、腌菜、水果等物，但那时的筵宴规模与开销，还难以同后世相比。到乾隆皇帝东巡时，由于国力强盛和皇帝喜好排场，其筵宴不仅人数增加，且所用食品也更为丰盛。从乾隆四十八年盛京内务府采办食品的一份清单中，可看出当时筵宴的规模和宴用食品的种类及其花费。

大宴桌一张，采买油、面、糖及干鲜果品物料等项费用如下：白

面一百三十斤，苏油五斤，鸡蛋二百五十个，小米九升，白蜜五斤，芝麻三升六合，澄沙三升，干绿豆粉十五斤，白糖稀五斤，白盐一斤,白猪油三十斤,白糖三十四斤,细桃仁八斤,黑枣五斤,桃仁一斤,圆眼一斤,红花水三斤,红棉二十张,枝子八两,靛花五两,菠菜叶十斤,岗榴六个,蜜梨二十五个,红梨十五个,秋梨十五个,槟子四十个,沙果四十个,苹果二十个,桃十二个,鲜葡萄五斤,乌梨一斤,风枝一斤,桂圆一斤,白葡萄干一斤,松仁一斤八两,榛仁二斤,细桃仁一斤，以上共用银二十三两四钱五分五厘。

跟桌一百张，每桌用面一百二十斤，苏油二十九斤，小米九升，鸡蛋八十个,蜜三斤八两,白糖稀一斤,白糖三斤,红花水四两,红棉一张,岗榴七个,红梨七个,糖梨七个,蜜梨七个,鲜葡萄一斤八两,荔枝八两,圆眼八两,白葡萄八两,榛仁一斤,松仁一斤,桃仁一斤,黑枣一斤,红枣一斤,红梨片八两……,以上共用银两七百四十四两六钱。羊三十七只，共用银七十五两六钱。合计用银两八百四十三两六钱五分五厘。

从上述清单我们可知：第一，此次筵宴共设一百零一张宴桌，其中大宴桌一张，所用食品的种类和数量均超过跟桌，显然是供皇帝所用的‘御宴桌”,另一百张跟桌,则是为王公大臣、官员耆老等所用。以此推测，参加筵宴者至少有五百人以上。第二，清单中所列大部分物品是制作筵宴食品的原料。从种类和所用数量来看，主要是制作‘饽饽”之类的甜食点心。第三,所列采办诸物的花费,作为宫廷筵宴,虽不能算作‘铺张”,但也花去八百多两白银。以当时每斤白面二分二厘银价计算，可购买白面 38000 多斤,可供 100 个成年人食用一年。皇家用度之大于此可见一斑。

宫廷生活习俗

清初宫廷生活习俗，多来源于满族的生活习俗，但又形成了一

些不同的特点。

满族的先民长期生活在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以狩猎为主，辅之采集、畜牧和农耕。在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围猎、采集和捕鱼仍是重要的生产活动，因此，野猪、狍、鹿、熊、虎、雉、兔等兽肉和鱼肉不仅是满族人的主要食物，在宫廷内的日常食品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另外，满族是一个喜爱养猪的民族，其先民以“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因养猪历史悠久，故满族在民间和宫廷内都有以猪作为祭神、祭天和祭祖的习俗。满族人特别爱吃猪肉，过年过节、祭祀或亲朋好友来访都要杀猪吃肉。祭祀时吃福肉，合族而食，吃得越干净越好。吃福肉不用盐酱，后来便发展为满族有名的佳肴“白肉血肠”。宫廷中吃野味占重要比重，还经常食用猪油炒菜和食仔猪。

清初的采集活动兴盛，采有蘑菇、木耳、松子、红果、棒子、瓜、果、梨、葡萄、李子等满族人喜爱的食品，并源源不断地供应宫廷所需。季节性的捕鱼，使各种鲜鱼成为宫廷盛筵中的美味。

满族很早就已过着定居生活，在定居苏子河谷后，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主要种植高粱、稷（黄米）、小米、苞米（玉米）、黄豆、小豆、绿豆等。满族人爱食粘食，喜用黄米和粳米（也称“江米”）作糕食用，也作祭祀品供奉。在宫廷祭品中就有这种粘糕，说明宫中也爱吃这种食品。在宫中常食用的食品，还有用其他粮食做成的饽饽、麻花、豆包等食品和奶制品。由于打仗和行围守猎的需要，满族人外出时喜食用高粱、小米做成的炒面。满族人喜欢饮用粮食、谷子酿制的酒，其中分为黄酒、烧酒两种。酒同样是宫廷祭祀和宫廷筵宴不可缺少的饮料。

养蜂采蜜是满族人重要的生产活动之一。蜜制食品颇受满族人喜爱，民间如此，皇宫内也如此。因此，在长白山区有专门养蜂采蜜的“蜜户”，盛京内务府有从事养蜂采蜜的“蜜丁”，皇宫中有“蜜仓”和“熬蜜房”，说明蜂蜜已成为宫廷中不可缺少的佐膳之品。

同民间一样,满族人喜爱吃的白菜、茄子、芹菜、菠菜、韭菜、萝卜、瓜等这些蔬菜也是宫廷中经常食用的。

此外，满族人有着孝敬父母、尊敬长者和热情好客的传统习俗。这在宫廷生活中也表现得很明显。从努尔哈赤、皇太极到入关后的清朝统治者，每逢年节都要祭祀祖先，将同族长辈或姻亲长辈请进宫中设宴款待,礼敬赏赐。并且在崇政殿、清宁宫、凤凰楼多次宴请外藩使节和客人。

宫廷中的娱乐活动是经常进行的，每到喜庆节日时，都要演种种‘玩艺儿”,备‘陈乐舞’以及‘妇女吹弹为戏’等。在大型庆典和筵宴中更要奏乐和舞蹈，并且渐渐地从纯娱乐变成了宫廷的礼规制度。在宫中，体育活动尤为丰富多采。开展较为普遍的有骑马、射箭、打猎、角抵、滑雪及冰上运动等。满族是一个强悍的民族,许多体育活动在清初是带有军事性质的。如骑马、射箭、角抵等既是满族重要的生产活动，同样是战场上所必须具备的本领。满族贵族中不仅男子如此,妇女,甚至汗、贝勒的福晋,五六岁的皇子也经常外出练习骑射。努尔哈赤、皇太极均是神箭手。据记载,1588 年 4 月，努尔哈赤亲迎哈达万汗孙女阿敏为妃时，人马行进到一个称“洞”的地方，与东果部第一号射手纽妄肩比赛射箭，目标是百余步外的一棵柳树。纽妄肩下马挽弓射五箭，二箭射失，而射中的三箭上下不一。轮到努尔哈赤射时，只见他挽弓连发五箭，箭箭皆中，而且“五矢(箭)攒于一处,相去不过五寸”,使在场的人心服口服。皇太极也从小习箭，并对箭法很有研究，他提出“当令以角弓羽箭习射，幼者当以木弓柳箭习射”。有一次征伐蒙古察哈尔，皇太极在行幄中筵宴诸蒙古贝勒，他抬头看见天空有一飞禽飞过，便执弓拔箭一弓射下，令众蒙古贝勒赞叹不已。

每当在皇宫大政殿举行祭天地、授尊号或建太庙礼成等的典礼大宴后,便有满洲、蒙古、汉人诸贝勒大臣及侍卫间的较射,以示助兴。

皇室贵族及妻妾子弟对滑雪和冰上运动尤有兴趣。努尔哈赤在冬季征战北方部族时，曾令八旗官兵栓上有脚齿的木屐滑雪而行，以加速行军。天命十年正月初二，努尔哈赤率满、蒙、汉诸王贝勒官员及其妻妾，在浑河支流的太子河上进行冰上体育比赛。首先由男人们进行“蹴鞠之戏”，即在冰上踢行头。参加者既要在冰上快速奔跑抢球，又要以一足立于冰上一足踢球，难度很大，运动量也很大。接着，由妇女们进行冰上赛跑比赛。比赛分三组进行。一组为汉官妻妾 36 人，在终点 18 处放二二 20 两、10 两不等的银子，这是奖给获胜者的奖品。结果跑在前面的 18 人得到了银子，落后的 18 人各赏银 3 两。第二组由蒙古小台吉的福晋们 16 人在冰上赛跑，终点 8 个地方放银 20 两，结果获胜的 8 人各得银子 20 两，落后的 8 人也各得赏银 10 两。第三组是由满、蒙混合的 14 人赛跑，获前二名者获银 20 两、金 1 两的重奖，其余获赏银 5 两、金 1 两。最后，努尔哈赤在冰上举行盛宴，既是运动，又是节庆。在比赛中，胜者得奖，落伍者得赏，有的人不慎滑倒而引起哄笑，场面十分热闹。

在宫中娱乐项目中还有满族人喜爱的“角抵”“捕戏”“赛马等等，这些均与民间大体相同。

宫廷服饰

清初的宫廷服饰，突出地反映了满族的民族特点，但是与满族的生活服饰有所区别和发展。

清入关前已经有了衣冠定制。努尔哈赤在天命建元之初，为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就号召全国为缫丝织缎而饲养家蚕；为织布而种植棉花。由于布匹、缎子少，一般兵丁多穿皮衣，靠战争和掠夺的一点缎、布衣服，只有众贝勒大臣等贵族们穿用。努尔哈赤本人则“头戴着有三个东珠的金佛头暖帽”，身着“秋香色的花缎子衣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